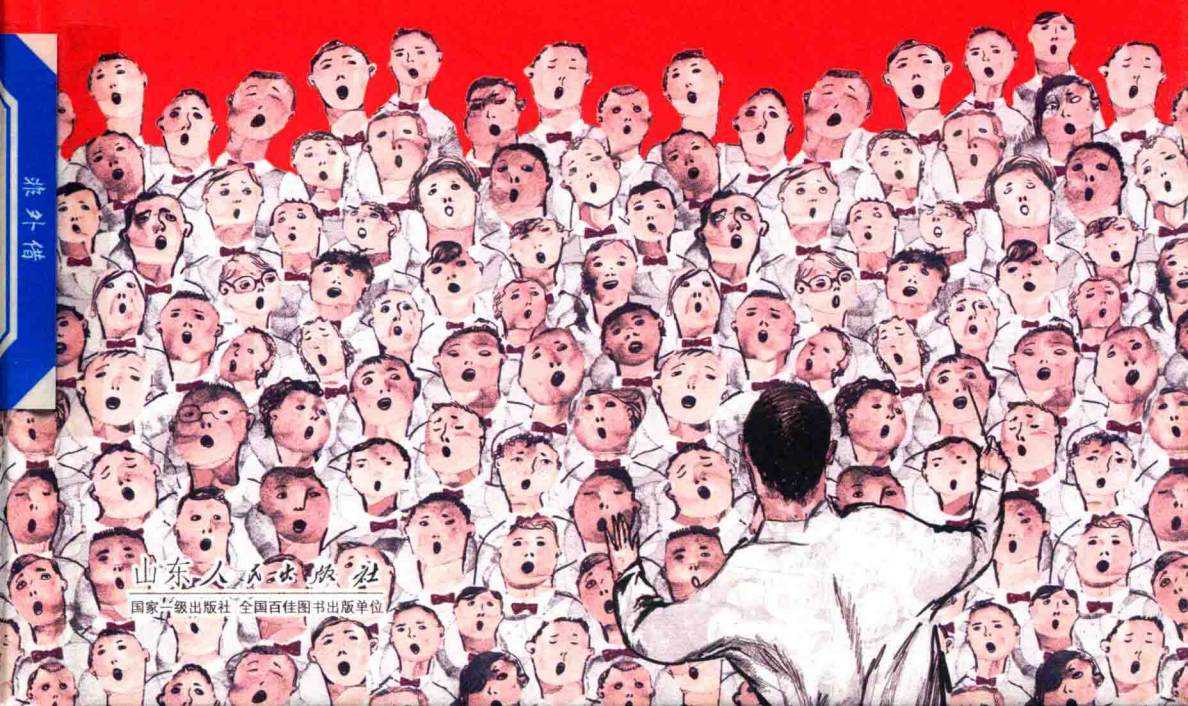


叶兆言散文精选

叶兆言
著

唱情歌的季节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张永浩

叶兆言
著

唱情歌

的

季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兆言散文精选. 唱情歌的季节 / 叶兆言著. —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—7—209—11364—9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7613 号

唱情歌的季节

叶兆言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65 号

邮 编 250002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914

市场部(0531)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 开(155mm×225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—7—209—11364—9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·
·
·

- 001/流浪之夜
- 006/祠堂小学
- 009/小资产阶级
- 012/学赌
- 015/关于狗的回忆
- 017/恐怖的夜晚
- 020/宝像引起的话题
- 023/我与小学语文
- 025/关于桥
- 030/关于流水
- 035/难得有闲
- 037/玩半导体收音机
- 039/非法买卖
- 041/玩摄影
- 043/玩音乐
- 046/开始玩电脑
- 048/没有文学的少年
- 050/失去的老房子
- 055/唱情歌的季节

060/把钟拨快些
065/等剃头
068/自行车的前思后想
072/电视的话题
077/二十年前的求偶
080/学抽烟
082/香烟往事
084/香烟往事续
086/香烟往事再续
088/喝醉酒
090/想读书
092/想上大学的日子
097/学日语
099/学英语
102/文学少年
110/文学青年
117/我的作文经历
120/家学渊源
122/藏书状元门下
127/借书满架
129/文学没有世家
131/最初的小说
133/发表第一篇小说
135/两件最得意的事
137/被包养的作家
139/命题作文
141/砚田的收入
143/不喜欢屈原的理由

145/皇帝跑哪去了
147/三次中学讲课记忆
149/也说经典
151/不得不再说的经典
153/前辈作家的教诲
155/从《背影》说开去
157/又想到了考大学
159/考上了大学
161/如果考不上大学
163/什么样的大学生最有出息
165/对母校的记忆
168/大学时代体育热
171/作文的糗事之一
173/写小说当毕业论文
175/大学不喜欢告密者
177/当不了和尚
180/骑车旅行
183/饿得够呛
185/大学毕业前的谈话
187/大学毕业，分配工作
189/跟人事局长见面
191/当上了大学老师
193/中学加衙门
195/我的两个学生
197/古典文学的浑水
199/程门未曾立雪
201/理想中的中文系
203/命中注定的前程

205/写作是一种修炼

207/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

210/想当官

212/想发财

214/想清高

216/想生气

218/糟践自己

221/欲望的尽头

223/满足温饱

226/散步

228/道法自然

231/后记

流浪之夜

一九六六年那一年，我正好九岁。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。街上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被拉出来游街示众，胸口挂着大牌子，头上顶着纸糊的高帽，演戏一样从街上走过。我们一群孩子跟在后面追，跟着喊口号，跟着胆子大的孩子往被游街示众的人身上扔石子。

九岁之前，我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。我是独子，父亲是剧团的编剧，母亲是名演员，家里有保姆，日子舒服得让人羡慕。我在一个受人宠爱的环境里被娇生惯养，当我出现在剧团里的时候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争先恐后抢着抱我玩，口袋里动不动就被塞满糖果，要不然就是被塞进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玩具。

到了九岁这一年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学校里常唱的几句顺口溜：

吴晗邓拓廖沫沙，

屁股上面一个疤。

先是砸三家村，然后抄资本家的家，斗“走资派”，批判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我当时只知道热闹，只知道好玩。红色风暴像一场大游戏。终于抄家也抄到了我们家，一大帮人，打着“造反派”的旗子，浩浩荡荡进了院子，都神气十足戴着红袖套。有年纪小的，带头的便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。有年纪大的，是剧团里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司鼓手。都绷着脸，满腔义愤长驱直入，庄严地宣布了几句什么，翻箱倒柜大打出手。

我和保姆被关在了厨房里，“造反派”进进出出如临大敌。忽然有一个“造反派”跑过来，对在厨房里看我们的“造反派”很神秘地透露消息，说已经抄到了金子。那时候只有在资本家的家中才能抄到金条，我们家当时唯一的金器，是我奶奶送给我母亲的一根金项链。房间里乒乒乓乓响个不停，“造反派”嚷着要撬地板找金条。

我母亲的得意弟子突然出现在厨房，先是铁青着脸和保姆谈话，勒令保姆向我母亲索取三个月的薪水，立刻卷铺盖滚蛋。然后与我聊天，她变得和颜悦色，教导我应该如何和父母划清界限。说着说着，很不当一回事地，摸起我的口袋来，很显然，她怀疑我母亲会把什么东西藏在我身上。

我身上除了毛主席像章，什么也没有。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很珍贵，走在路上，青天白日的，常有人抢了就跑。因为害怕被抢走，所有的像章都让我别在了衣服的背面，衣服一撩开，金光闪闪一大排。

“哎哟，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！”我母亲的得意弟子为我所感动，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，“我知道你是真热爱毛主席。”

一直抄到天快黑了，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才打道回府。除了厨房，所有的房间都被封上了封条，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被送进了牛棚。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，只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整个地被遗忘了，我的父母把我忘了，“造反派”也把我忘了。天很快黑了下来，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，真有些

害怕，于是便想到跑到大街上去。

大街上热闹非凡，那是一个让许多人都亢奋的年代，没日没夜，没是没非。炎热的夏夜，街上到处都是纳凉的人群，动不动就有敲锣打鼓的游街队伍开过来。是路口就有人在那情绪激昂地演说，在那上演新编的街头剧，那是风行一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。在这样的年头里竟然还有耍猴的，还有卖狗皮膏药的，还有成群成群讨饭的。一个拐角处，一个男人站在阴影处，对着远处的人群尿尿，一边尿，一边乱动。我觉得好奇，便盯着那男人看，那男人动着动着不动了，脸色恐怖地张大了嘴，眼睛依然对着远处的人群。他突然注意到我在偷看，恶声恶气骂了我一声。

我完全忘记了饥饿，也不知疲倦，就这么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漫游，哪里声音大就往哪钻。夜越来越深，人开始逐渐减少，很多人就堂而皇之在街上睡了。不想睡觉的，都自发地集中在不多的几个点上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晚还不睡觉的历史，随着有趣的事一个接一个消失，我觉得困了，眼皮不由自主打起架来。我想回家睡觉，可是天太黑，不敢一个人回去，而且知道即使回去了，仍然也是一个人，独自一个人怎么能睡觉呢。我发现不远处的台阶上，有几个比我大出有限的孩子正在那说话，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。

“小孩，你是红帮还是黑帮？”一个十四五岁显然是头儿的男孩子，见我走到他们面前，很严肃地用安徽腔问道。

我当然说自己不是黑帮。

“那好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红色司令部。”说话的男孩子站了起来，很神气地跟我握了握手。我立刻发现他是个瘸子，手劲很大，捏得我直甩手。

“他是老红军的儿子，他和毛主席握过手，你再和他握手，你就等于和毛主席握过手了。”和他一起的小孩子一本正经地对我说。

“你怎么跑出来了？”那个是头儿的小男孩又问我。

我如实禀告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家就是黑帮了，那好，你领我们去，黑帮的东西，必须共产。”那个是头儿的小男孩让我领他们去我家。

我告诉他们我家已经被封条封住，他们便提出可以从窗户里爬进去。“你们家肯定有钱，你总知道钱锁在哪个抽屉里吧？”我遇到的其实是一群安徽流窜过来的小流浪汉，“喂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”

我挨个地把口袋翻给他们看，除了毛主席像章，我身上一无所有，这让他们非常失望。

“你们要去哪儿呢？”我充满好奇心地问他们。

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他们将步行去北京，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。

“能不能带我去呢？”我当时真是羡慕极了，恳求他们也给我一个机会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顿时又是异口同声的反对。

临了，那个是头儿的小男孩让我站好了，对我上上下下一番打量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好吧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，不过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要服从命令听指挥。你这样的，肯定能走到北京。”

于是我被接纳到了流浪汉的队伍里，不一会，我们出发了。沿着大街往前走，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，走到一个凸起的大平台前面。那个是头儿的小男孩发出命令，让我们排成一排在平台上躺下睡觉。这正合我的心意，我实在有些累了，迷迷糊糊刚倒下就要睡着，是头儿的小男孩又命令我把鞋子脱下来，枕在脑袋底下，说是这样，既可以当枕头，又可以防止鞋子被小偷偷走。

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，搁在脑袋下面，美美地进入了梦乡。在蜜一样的梦中，我梦见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，跋山涉水，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，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。人山人海，一片欢呼声，我的鞋子被挤掉了，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涌去，一直冲到了最前面，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

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。

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。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。我早已从平台的这一头，滚到了另一头。我的鞋没有了，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踪无影了。

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赤裸裸活生生被欺骗。小流浪汉趁我熟睡之际，毫不含糊地洗劫了我的鞋子。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。我抹着伤心的泪，光着小脚丫，踏上了回家的路程，饥饿像小虫子一样咬着我的胃。一个九岁的小男孩，在流浪之夜大开了眼界，遇到了许许多多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有许多事当时就明白了，有许多事要多少年以后才能明白，还有许多事却永远也不会明白。

1992年6月20日

祠堂小学

我在农村念过三年小学，其中有大半年是在村祠堂小学度过的。祠堂小学，顾名思义，是由一极小的祠堂改建的。就一间教室，一个老师，门口挖了个坑，埋上一口大缸，中间隔一块木板算是男女厕所。大约三十名学生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，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

老师大约三十多岁，胸前挂着哨子，上课下课，很潇洒地吹几声哨子。他长得很白净，见了大姑娘小媳妇，眼睛顿时发亮，常常忍不住说几句荤话，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小学门前是生产队的打谷场，来来往往人很多。有一次正上着课，老师的媳妇找来了，把他拉到打谷场上训话，一训就是半天。

早过了下课时间，学生们在教室里自然不肯老实，除了不大声喧哗，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敢干。黑板上被涂抹得一塌糊涂，画了只大乌龟，几句标语似的下流话后面跟着好大的感叹号。唯一的一把扫帚和一个铁皮小桶放在了虚掩的门上。老师的媳妇火冒三丈，训起话来没完没了，老师一头一脸低头认罪的模样，正在教室里的学生早被他忘到九霄云外了。做好的圈套迟迟派不上用场，等得不

耐烦的学生黔驴技穷，终于大叫：“老师，我们肚子饿了。”

老师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奔过来，一边吹哨子，一边往教室里冲。铁皮小桶咚的一声砸在地上，那把扫帚非常准确地落在他头上。所有的学生快活地大笑，老师年轻漂亮的媳妇也笑，老师一边生气，一边也笑。

我那时仍然算是三年级的学生，当时正是“文革”最激烈的年头，我的父母在同一天里双双进了牛棚，我转眼间成了无人管教的野孩子，便避难到了农村的外祖母家。既然是避难，也顾不上许多。三年级是祠堂小学的最高学历，于是我不得不做留级生，屈尊再读三年级。

上课要教的内容我似乎都懂，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，一年级做算术，二年级写毛笔字，三年级大声地朗读课文。教室里永远乱糟糟，永远生气勃勃。老师仿佛是乐队的指挥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有条不紊安排着一切。祠堂小学没什么太较真的事，出点小差错也无妨。

老师严格起来，学生随便笑一笑他都会发火，马虎的话，学生上课时跑出去撒尿拉屎也没关系。常常有学生很潇洒地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，急匆匆跑出去，屁股撅多高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大模大样地在离教室不远的茅坑里方便。教室里的学生叫道：“喂，你屁股都让人看到了！”那边不服气地说：“看到就看到，你又不是没有。”

有时老师上着课，忽然心血来潮，便把我叫到侧面的厢房里。那是老师简陋的办公室，放着一张课桌，一把椅子，还有一张小床，桌上堆着作业本，一盏油灯。老师将作业本往边上挪挪，摊开了象棋，拿掉自己的一个车，然后和我厮杀，不杀得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绝不罢休。有时棋下多了，影响他批改作业，他一本正经地改出几个样本，指使我依葫芦画瓢，照着他的样子改。像抢什么似的，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作业改完，火烧火燎地发还给学生，然后接着

下棋。

我的棋艺很快有了长进，先是承让一个车，再下来是让马，到了后来，不用让一子，我和老师下棋也竟然互有胜负。老师是小孩脾气，不能输也不能赢，赢了喜欢乘胜追击，轻轻哼着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眉飞色舞；输了当然不肯服气，一遍遍重来，脸色沉重地将棋子重新放好，走到教室里，吹吹哨子，“下课了，下课了！”再回来，看着棋盘，“好，再来一盘，决一雌雄。”于是昏天黑地乱杀一气，一直杀到我外祖母找来。

老师终于吃了批评，谁批评了他，我始终不曾知道。有一天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脸色深沉地说：“我们再下最后一次，以后不下了，省得人家乱说话。”这一盘棋下了很长时间，临了到底是谁赢了，已经记不清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这以后，我再也没和老师下过棋。

事实上，我从此也就失去了下象棋的兴趣。

小资产阶级

有些事总是让人耿耿于怀，怎么也忘不了。那时候是“文革”最激烈的年头，我去农村完全是为了避难。在祠堂小学念了大半年书以后，我算是升级了，又去一个小镇上读小学。小镇上的小学自然像模像样，很有些正规。

这里远离城市，凡事都要稍稍慢几拍，记得有一天突然开全校大会，说是要成立红小兵。校领导充满感情地高声说：“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。”下面顿时一片掌声，情绪激昂。会议一散，都回到课桌前，摩拳擦掌，又是写申请书，又是写决心书，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了。

很快发了表格下来，让大家填，碰到了家庭成分这一栏。这里的农村和我们通常在书上或电影上见到的不一样，全是贫农，没有地主。有钱的地主都在城里，不是经商，便是经营实业，即所谓民族资本家。大家争先恐后地填表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家庭成分烦神。当时小学四年级，说懂，好像什么都懂，说不懂，糊里糊涂一样也不明白。我的父母在南京被批斗得死去活来，各式各样罪名一大堆。到底填什么成分让我煞费苦心，同学们都抢着去交已填好的

表格，我犹豫再三，终于在感觉上最轻的罪名里随手拈了一个。填的是“小资产阶级”，记忆中，在南京时，听红卫兵小将演讲，曾听到过工人是无产阶级，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说法。我如此填写，实在也有些小滑头的意思。

没想到却是捅了马蜂窝，在清一色的“贫农”中间，我是小资产阶级，这还了得。老师拿了我的表格，脸上立刻有些紧张，匆匆去找校领导，校领导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小资产阶级，当然不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。”第二天，发红小兵袖章，除了我，全班一片红，一人一个红箍套在胳膊上，得意扬扬神气活现。班上的一些女孩子老是偷看我，我心里好难过，几次想哭，都忍住了。

我从此有了个“小资产阶级”的绰号，大家都开始刮目相看，动不动就用这绰号折磨我。有一天，老师很认真地和我谈话，让我以后天天早点去，把教室的地打扫一下。我一向是听老师话的好孩子，因此也不敢反驳，低着头不吭声。老师说：“你好好改造，说不定以后哪一天，也可以参加红小兵。”

我又开始逃学，在南京时我也逃过学，那是在看见父母被押着游街后。我觉得非常的自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。当人们信口议论被游街人的种种狼狈相，我心里便像刀割似的。当时因为逃学，在牛棚的父母甚至由“造反派”陪同着报过警。我被送到农村的直接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独子，没人管教，流落街头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坏孩子。

想不到在农村不过一年多一些，我又开始逃学了。我不想让外祖母知道，天天仍然上学时出门，放学时归来。大约过了一星期，我回到家去，发现老师正和外祖母坐在一起说话。外祖母见了我，劈头就是一通骂。老师说：“算了，骂他也没用。喂，你还是去上学吧。”我不说话，也无话可说。老师非常和蔼地看着我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外祖母怒气冲冲的，在一边时不时地嘀咕几句。老师又说：“老太太，不说他了，你外孙也不是那种不想读书的人。”